

# 当代中国乡村典型产生的动力机制溯源

董颖鑫

**摘要**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为了尽快实现农村现代化的目标,党在乡村建设中树立典型,并赋予这些典型引导乡村建设的政治功能。当代中国乡村发展史几乎可以被看成是以乡村典型变迁为标志的发展史。乡村典型的产生是历史、文化和政治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仅就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若干理论和实践来看,其产生的动力机制由四方面构成:(1)中国革命遗产提供了历史动力;(2)群众路线思想提供了理论动力;(3)乡村发展“锦标赛”提供了体制动力;(4)乡村制度的非连续性变迁提供了乡村典型不断更替的现实动力。

**关键词** 乡村典型 革命遗产 群众路线 锦标赛体制 乡村制度变迁

1949年以来的乡村建设中,党一直都在树立乡村集体典型(以下简称乡村典型),如合作化时期的西沟村、大跃进时期的嵯峨山人民公社、“小”人民公社时期的大寨大队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小岗村和华西村等。树立乡村典型在改革开放前或许和“毛泽东最感兴趣和最关注的是农业和意识形态这两大领域”<sup>①</sup>有关,因为乡村典型既来自农业领域,又鲜明地体现了意识形态追求;改革开放后,这种动员方式仍在乡村延续则可能是政治管理惯性的表现。显然,乡村典型的产生原因不止这么简单。本文将基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若干理论和实践对乡村典型产生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

## 一、中国革命遗产是当代中国乡村典型产生的历史动力

中国革命遗产为建国后乡村典型的产生提供了路径依赖和历史动力,因为“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

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sup>②</sup>。早在革命时期,党就在根据地建设中树立过大批典型,这些典型是建国后乡村典型的滥觞。

党在陕甘宁边区时就明确提出了产生、推广和培养劳模的基本方法及劳模运动的发展方向<sup>③</sup>,把抓典型和开展劳模运动作为乡村建设的突破口。毛泽东强调,“不把陕甘宁边区一些农业劳动英雄的模范劳动方法……推行于各地,而说这些方法不能在某些根据地推行的观点,是错误的”<sup>④</sup>。何况,开展劳模运动的意义深远,不仅“是新的、比较有效的”一种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也是创造典型和推广典型

①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82页。

② 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页。

③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54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2页。

的运动”，还是“思想上的革命”，能“纠正‘劳动下贱’为‘劳动光荣’”，“纠正‘穷是命里注定’为‘劳动致富’”。因此，“这些英雄与模范，给了我们建设新民主主义即新三民主义社会所必不可少的、但是在全世界上又是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活的教科书。一项工作中出了一个或几个这样的英雄或模范，大家向他学习，向他看齐，就可以把一项工作做好！就解决了建设新中国的一部分的问题”。劳模作用如此重大，其他根据地也都不同程度地开展了劳模运动。在劳模运动中最初树立的是个人典型，为了体现意识形态追求，也为了完成迫切的生产任务和整合乡村社会，后来所树立的劳模多是合作运动的带头人，从个人英雄向集体模范发展，要能创造模范村<sup>①</sup>，如陕甘宁边区的吴满有与吴家枣园、太行根据地的李顺达与西沟村等。模范村相比于个体劳动英雄，影响范围更大，能带动更多的农民，符合“组织起来”的方向。现在看来，通过劳模运动进行根据地建设，成效显著，可视为成功经验，没有理由在建国后不发扬光大。

换个角度看，陕甘宁边区本身又何尝不是在更大规模上树立的典型，如任弼时所说，“陕甘宁边区对于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来说，是处于一种领袖的地位，即根据地的领袖地位。这个区域里的一切重要设施，对于其他根据地有一种先导的模范的作用，要为其他根据地所效法”<sup>②</sup>。也就是说，在陕甘宁边区建设中所探索出的有效经验和办法必须能在其他根据地得到推广运用，其所包含的逻辑与树典型的后进学先进的逻辑具有内在一致性。这种逻辑内在于中国革命的渐进方式，因为“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sup>③</sup>，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占绝对优势，这意味着中国革命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艰难的渐进过程，“不是经过起义一举夺取中央政权，而后把革命迅速地推向全国；而是经过战争首先在局部地区建立革命政权，而后逐步地、波浪式地把这种政权推向全国的”<sup>④</sup>。中国革命的渐进性特点决定了只能先在偏远的农村建立根据地，摒弃乡村原有的统治方式，探索乡村建设的新办法，将其建成为后解放地区的“模型”，乃至“新中国的雏形”，如毛泽东所言，把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sup>⑤</sup>。实际上，这已经在树典型了，只是此典型的级别更高，区

域更大，内容更多。这种根据地建设的逻辑也容易从宏观到微观逐渐延伸到根据地建设的各个层面，不仅对根据地的乡村建设方法和模式产生导向作用，也必然在建国后的乡村建设中继续发挥作用。

## 二、群众路线思想是当代中国乡村典型产生的理论动力

群众路线在党的思想体系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是树立乡村典型的理论基础和动力，并进一步成为树立乡村典型的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因此，“人民群众自己的解放，只有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斗争，自己起来争取，才能获得，才能保持与巩固”<sup>⑥</sup>。群众路线里的“群众”易被看成大包大揽的混沌概念，实际上，在贯彻群众路线的过程中可被清晰地划分为不同层次，即“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这种政治区隔把有关群众的认识论有效地转化为动员群众的方法论，即“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的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sup>⑦</sup>。群众中的先进分子“是以其积极性和较高素质在群众中自发产生的”，是群众“在政治上的主体地位、积极状态和集体行动的体现”<sup>⑧</sup>，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先锋模范。他们的做法和想法往往既具有创新性、实效性，又符合党的要求，所以，通过走群众路线开展群众运动，其实质就是依赖群众中脱颖而出的“积极分子”来带动群众，主要方法是把他们树为典型，因为他们的草根性与可视性的特点便于“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学习，是动员群众的着力点和催化剂。

历数建国六十多年来的各类典型，或以乡村典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8~76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8页。

④ 沙健孙：《中国革命史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3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5页。

⑥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4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8页。

⑧ 周全华：《群众路线新透视》，《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 三、乡村发展“锦标赛”是当代中国乡村典型产生的体制动力

型影响最大,这是因为“毛主义非常著名的‘相信群众’的观点,实质上是对中国人民的绝大多数、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主角——农民的信任”<sup>①</sup>,是因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sup>②</sup>,而中国长期处于落后的农业社会,社会的多数人是处于底层的农民,为大多数人谋幸福首先就是为农民谋幸福,群众动员的主要对象自然是农民。何况,党是依靠农民才获得国家的领导权。只是,对农民的信任理所应当体现在对乡村积极分子的信任,因其不但政治忠诚,发挥着生产和工作中的“带头作用”、作为群众核心的“骨干作用”以及领导和群众相沟通的“桥梁作用”<sup>③</sup>,还以其所在集体为平台,使该集体上升为典型。个体典型与集体典型密不可分,成就个体典型的前提是集体成为典型,集体典型实质上是个体典型依附之根本和意义之所在,如陈永贵之于大寨,吴仁宝之于华西村。因此,走群众路线一开始可能是树立个体典型,考虑到社会主义国家最重要的政治伦理是集体主义,树立以个体典型为核心的集体典型则更能彰显其政治价值,其结果是,在社会主义乡村走群众路线既树个体典型,也树集体典型,既强调个体的积极作用,更强调集体的导向作用,使他们成为意识形态的象征。

事实上,走群众路线还是推动乡村典型产生的直接来源。群众路线思想要求领导干部多在基层调查研究,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善于发现群众积极性和尊重群众创造精神,吸收群众智慧。毛泽东曾强调,“任何领导人员,凡不从下级个别单位的个别人员、个别事件取得具体经验者,必不能向一切单位作普遍的指导。这一方法必须普遍地提倡,使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学会使用”<sup>④</sup>。在农村则强调通过“解剖麻雀”调查农村的工作方法<sup>⑤</sup>。领导调查的地方往往都是精心选择出来的,原来的基础就很好,又为领导的调查研究提供了某一方面的工作经验,自然就具有了象征意义和标本价值,初衷可能只是将其作为一个普通的“麻雀”,但当从“麻雀”的具体经验中提炼出具有代表性的内容时,就难免“麻雀”变“凤凰”,因为“代表性”是“典型”的核心意义,具有“代表性”的事物当然具备“典型”的资格,对于“代表性”的重视,实质上就是抓典型。因此,乡村典型也是贯彻群众路线的直接结果。

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强大赶超压力驱使各级政府乡村建设中不断给下级政府下达各种指标,即“在高度中央集权的局面下,行政体制本身会内生出一种‘锦标赛’的独特现象”<sup>⑥</sup>,以解决激励难题。不过,在“锦标赛”体制下,竞赛思维不会仅限于各种经济指标,而会扩大到政治和社会管理领域,致使典型也加入锦标赛的行列。按道理,乡村典型的产生具有偶然性,难以作为明确的指标,但乡村典型对于提升政绩能呈立竿见影之效,所以,各级政府都积极树立乡村典型,并在把地方典型升格成全国典型上展开竞争。因为短时间内提高某地的乡村发展水平是非常困难的,而以乡村典型之“一斑”来展示地方之“全豹”,则不仅是使乡村工作成绩最大化的终南捷径,且与有荣焉。可想而知,底层乡村典型的数量应该很大,越往上越少,竞争越强,而竞争的内容无非是经济实绩、政治忠诚和道德表现。其中,经济发展容易被看到,也最具说服力,因此最重要,而政治忠诚和道德表现则要以经济为载体,既要为经济发展服务,又需卓越的经济实绩证明。但是,为了发挥乡村典型的示范引导作用和精神激励作用,乡村典型多出自穷乡僻壤,即使偶有亮点,其实然状态与作为乡村典型的应然状态之间难免存在差距,实难担当“典型”重任,因此,对目标村庄特殊的政治经济支持就构成乡村典型“锦标赛”的必要条件。

中国高度集权的政治管理体制给予了政府配置资源的自主性,使得各级政府能够集中有限的政治经济资源来支持目标村庄,以催生乡村典型。政治支持可表现在直接利用政治权力助生乡村典型,如嵯峨山卫星人民公社建立了全新的理想化的农村生产关系,赢得了全国的掌声和最高领导的青睐,但单

① 参见萧延中等编《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1卷,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76~7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14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7~902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05~308页。

⑥ 周飞舟:《锦标赛体制》,《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3期。

凭农民的能力和认知无法做到,只能是地方官员以宁左勿右的政治嗅觉运用权力制造这一典型。政治支持也可以表现为领导对乡村典型的关怀及由此所带来的舆论支持。这种关怀既可以是领导的象征性考察,也可是领导的明确指示和号召,都是赠予乡村典型的重要砝码,如“人民公社好”和“农业学大寨”等领袖语录使得嵯峨山公社和大寨大队成为全国人民朝拜的地方。两任总书记在改革开放二十周年和三十周年去小岗村视察,愈加凸显了小岗村农村改革典型的地位。政治支持有时则表现为对乡村典型的带头人的提拔任用。毛泽东早在陕甘宁边区就对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说过,“到了将来,你们可能成为干部,你们现在是干部的后备军”<sup>①</sup>。大寨是人民公社时期最大的典型,大寨的村支书就能拥有从大寨到中央的各级领导职务<sup>②</sup>,现在的南街村和大寨的领导也有县级以上职务。这种提拔任用在改革开放前后都普遍存在,也进一步巩固了乡村典型的地位。

当然,某个乡村能升级为典型最需要的还是经济支持。这种经济支持可分为无偿的经济援助、方便的银行贷款以及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在计划经济时期,乡村典型往往都能获得无偿经济援助。即使像大寨本以自力更生赢得典型称号,但“1964年以后,特别是‘文革’运动中,大寨获得的援助和照顾越来越多、甚至到处伸手”<sup>③</sup>。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典型主要是享受贷款优惠和政策优待。如以“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而著称的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主要依赖银行贷款,而这些贷款出于“扶典型”、“扛红旗”的政治考虑<sup>④</sup>,能够不计商业风险。小岗村出名后,由于发展水平低,一直获得各种无偿援助,早在1993年就免除了农业税,近年来又荣膺四星级的“政治”旅游景点<sup>⑤</sup>。且不说华西村在1978年前后的政府支持,“1998年前后纺织行业限产压锭时,华西村都得以大规模扩张。整顿小钢材、小煤电时,华西村的钢材厂、热电厂却得以超常规发展。另外,华西村可以到烟草等高度垄断行业分一杯羹,华西村股份能直接上市,没有政府的特殊照顾,实难想像”<sup>⑥</sup>。

典型与非典型之间的差距在相同的条件下本不显著,但由于乡村典型能迎合上级想法,使上级满意,从而获得上级政府的庇护,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

差异性的政策支持,这能有效拉开典型与非典型之间的差距,虽是人为制造乡村发展不平衡,却也使得乡村典型越来越“典型”,声誉越来越显赫。乡村发展“锦标赛”难免异化为乡村典型“锦标赛”。

## 四、乡村制度的非连续性变迁 是乡村典型不断更替的现实动力

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典型如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合作化时期树立了上百个全国乡村典型,如今又有几人知晓?如华西村般五十年红旗不倒的乡村典型可谓凤毛麟角。乡村典型的不断更替需从当代中国乡村制度的非连续性变迁来理解。

自新中国建立起,农村基层生产组织管理制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农业合作化阶段、人民公社阶段和包产到户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农村生产组织管理制度具有明显的差别,其演变清楚地表现为后一阶段的制度形式是对前一阶段制度形式的某种程度的否定,具有前后断裂的非连续性演变的特点。乡村制度之所以会发生非连续性变迁,根本原因是政府主导乡村发展,乡村制度变迁不是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变化的结果。

具体来看,农业合作化是依照苏联模式对中国几千年传统小农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第一步,对于广大农民来说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可农民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往往不能从抽象的文字层面准确理解党的意图,具体怎么办,只有借助活生生的实例,即乡村典型的“可见性”来示范引导。这种“可见性”切合中国传统的类比直观思维方式,对农民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和示范性,能产生见贤思齐的效果。因此,国家级的合作化典型遍布全国。但合作化仍以私有制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14页。

② 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15~16页。

③ 孙启泰、熊志勇:《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6~220页。

④ 冯仕政:《国家、市场与制度变迁》,《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2期。

⑤ 韩福东、雷敏:《为了不饿死,冒死“包产到户”》,《南方都市报》2008年1月4日。

⑥ 新望:《名村是怎样炼成的》,《南风窗》2003年第22期。

为基础,不能从根本上杜绝个体经济和分散的个体生产,也不能彻底瓦解“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sup>①</sup>,其结果自然是推进人民公社化,实行政社合一制度,因此,就有了嵯岬山卫星人民公社等典型,迅速在全国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潮。由于大跃进的失败,人民公社体制从“一大二公”退到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为此树立了大寨等典型。虽然“全国农业学大寨”,但人民公社的生产效率并没有根本性的好转,以致农民生活水平二十多年停滞不前,生计维艰,导致安徽、四川和贵州等省的农民在1979年不畏风险,大胆搞起了包产到组,甚至包产到户,而苏南农村也早已办起了不仅仅是为农服务的乡镇企业。小岗村、华西村等新时期名村陆续产生。

这种非连续性演变特点的形成根源是政府抱着急迫改变乡村贫穷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以一种革命理想主义激情主导乡村发展,总希望通过更加积极的主观努力实现赶超目标,从而压缩了乡村制度自发演变的渐进空间。共产党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则为政府主导提供了基本保障,而不断创设新的制度则为实现这种主导提供了载体。

一方面,制度仅就形式而言似乎很“柔弱”,可随便删改,但制度创新有其内在“硬”约束,罔顾此而强行推动制度变迁必然遭遇失败。另一方面,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前一种制度失败,可被新制度继承的就少,新制度的跳跃性就越强,制度前后断裂的非连续性演变特点就越明显。显然,制度非连续性变迁的结果,导致旧制度下的乡村典型不适合作为新制度下的乡村典型。为了推动特定阶段的乡村制度变迁,必然要在乡村建设中树立相应的乡村典型,以突出该阶段的发展目标,并张扬其价值追求,引导乡村发展。所以,每当需要推进乡村生产组织制度变迁的时候,各级政府就很自然地树立起相应的乡村典型,将其作为制度变迁的先行者和模范实践者,作为乡村新的生产组织形式的样板,发挥带头示范作用,其结果就是不断以新的典型代替旧的典型。因此,上世纪50年代有合作化的典范,六七十年代有人民公社的旗帜,改革开放以来有大包干和发展乡镇企业的明星村。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当我们论及乡村典型的制度变迁功能的时候,不是说乡村典型本身具有这样的政治推动力,只是说乡村典型好像是“自发地”并“超前地”创设出新制度,被用来作为有计划

地推动乡村制度变迁的范本。

乡村典型由于集中体现了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社会主义积极性”,并以集体自我奉献的方式强化党和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治理和控制,既能解决思想问题,使“采取消极态度的人们积极起来”,也可以解决实际问题<sup>②</sup>,所以在乡村工作中总是倍受重视。树立乡村典型是党在乡村建设中的积极探索,乡村典型作为中国乡村建设应然状态的具象物,作为中国乡村制度变迁的标杆,不仅克服一般乡村发展的盲目性,还能以乡村典型的完美的实然状态昭示一般乡村发展的可能性,强化人们对乡村社会发展理想状态的体认,引领乡村社会的进步,促成中国乡村社会的有计划变迁。树立乡村典型已然成为社会主义乡村建设的新传统,即使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多元开放时代,仍是动员乡村社会的重要方法。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当代中国乡村典型政治研究”(项目号:10YJA810005)暨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当代中国乡村典型的政治学分析”(项目号:10sk493)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董颖鑫 巢湖学院乡村治理研究所副教授)

责任编辑:杨 好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21~224页。